

史學家談文獻檔案的歷史使命

郭俊逸

三月十八日至今，台灣接連發生許多社會運動，留下許多影像與資料。而四月初，比利時魯汶大學歷史學教授Paul Servais此次來台在中央大學法文研究所那場關於檔案工作者（les archivistes）的演講，則令人對近日社會議題又激起更多思索。甫開場，教授便指出「檔案」（les archives）是歷史的見證與社會之源。演講中，Servais教授將檔案粗分為國家機器所頒行的行政、管理用途之政治性文件，以及名人、平民百姓等所書寫的私人性文件。廣義而言，這些檔案皆是史料文獻。此外，教授更對檔案的載體作出比較。最後歸結出由於今日社會擁有這些足以抵抗時間摧殘的史料，才使得當代和後代人能窺探出過去社會生活的脈動，從中建構出時代的記憶與歷史。

為了留住記錄，承載記憶的物件自西元前的石板、莎草紙和羊皮紙，中世紀的紙張，到當代

的膠卷底片，最終進化到光碟、硬碟等材質。令人驚訝的是，一路的演變過程中，竟然是越古老的載體越能抵禦時間，直至今日它們依然能發揮其功用；相反的則是現代數位3C產品不僅需小心翼翼地保存，更可能超過十年便已無法再使用。在載體的更替過程中，演變趨勢朝向抽象化與普及化，雲端硬碟與網路的普及後，使用者不必再帶著成堆檔案在身。此趨勢或許可謂是因應龐大的書寫需求而演變，然而其背後更反映著權力的移轉。記錄的權力不再僅是國家或權貴階級所獨有，一般平民百姓亦能記錄過去並留下見證。

隨著時間推移，數以萬計的檔案被生產出來，相同地，成千上萬的檔案亦隨著時間消逝，在檔案數量繁複龐大的現代，該如何將其保護並歸檔入冊，以及該汰選何類文件留存，皆不是能



圖一：Paul Servais 教授於演講後與中央大學法文系師生合影。

輕易回答的問題。因此，教授特別指出檔案之處理目的應基於對真相的追尋，而非為了掩蓋真相。在談論對真相之追求這點時，Servais教授更特別引用中世紀時，教皇曾為鞏固教廷的權力，偽造了《君士坦丁的捐贈》（Donatio Constantini）這份文件，藉以合法化其政權的正當性。在資訊流通不若今日發達的中世紀，一直要等到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學者洛倫佐·瓦拉（Lorenzo Valla）以詮釋學式的文本批評方法檢視其遣詞用字，這份偽文才被戳破。

演講最後，蔡淑玲老師提問了關於檔案工作者的敘事（narration）與文獻之關聯，在此，若我們以近日在島上發生的諸多社會運動為例，影像本身所明顯呈現的事實被貧乏地詮釋成「拍肩」、「路過」，甚或是過度詮釋為「暴民」、「恐嚇」等偽真相，我們也許便能深刻地體會敘事與詮釋之於文獻乃至歷史的重要性。Servais教授最後指出作為一個檔案工作者的使命不僅在於



圖二：Servais教授在演講中也提到史學家Arlette Farge的散文小品，論「玩味檔案」的無限樂趣。

釐清檔案之真假，更須適度地對文獻進行詮釋。意即為了避免社會群體的記憶受到扭曲或蒙蔽，忠實地呈現文獻所承載之事實，歷史才不至於遭致竄改，如此完整無誤的歷史才得以確保。而今日拜科技之賜，人人都能記錄歷史，皆有成為檔案工作者之可能，也因此追求真相、替真相發聲之責任亦不應再落在少數人的肩上。

（本文摘錄者為中央大學法文系碩士生）

國立政治大學教授阮若缺女士獲頒法國教育榮譽騎士勳位

2014年5月5日，法國在台協會舉行贈勳儀式，由法國在台協會學術合作暨文化處處長金默言先生，頒授政大外語學院教授阮若缺女士「法國教育榮譽騎士勳位」。

阮若缺女士先後取得輔仁大學法文學士、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法文碩士，以及巴黎第三大學戲劇博士。曾擔任政治大學外語學院副院長、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秘書長。現為台灣法國文化協會理事會及台灣法語譯者協會主要成員。



阮教授執教多年來，於法語教學、戲劇、文學、翻譯等文教領域建樹豐偉，耕耘不懈，作育英才無數。身為台灣法語重要譯者，譯作超過二十部，涵蓋戲劇、女性主義、青少年文學作品等，對法國文化於台灣之傳揚，獻力卓深。

有鑑於阮女士對法台文化交流之貢獻，法國政府決定授與她「法國教育榮譽騎士勳位」。

（資料來源：法國在台協會）